

虛擬的懷古場所·真實的身體經驗 ——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

李 嘉 瑜**

摘 要

李陵臺是元代上京紀行詩中最受書寫者青睞的題材。相較於其他時代的李陵臺書寫，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其空間意涵顯然已發生質變，因為它不再是無法到達的想像地景，而是一場親身觀察旅行中可以望見或觀看的場所，更特別的是它屬於記憶性古蹟。但對於上京紀行詩的書寫者而言，它是不是李陵臺的原址，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地方能喚起有關李陵與李陵臺的歷史記憶，而且只要有人願意持續性的回憶，這個地方就會存在。所以真實的歷史記憶就這樣附著於虛擬的懷古場所中，讓元代兩京旅程中的荒臺（荒山）成功地接收了李陵與李陵臺的相關記憶，進而豐富了自身的文化意義。

本文將以文化地理學做為主要參考架構，探析上京紀行詩中的書寫者們將如何定義眼前所觀覽的記憶性古蹟？而通過懷古的紀念儀式，他們又在李陵臺的空間中植入了哪些歷史記憶？我們希冀藉由此一討論，深化元代上京紀行詩研究的層面與論述。

關鍵詞：元詩、上京紀行詩、李陵、李陵臺、文化地理學

* 本文為 101 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101-2410-H-152-018。又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13 年第十三屆「文學與美學——抒情與敘事」學術研討會，承蒙講評人曹淑娟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讓本文的論述能得到深化與補正的機會，謹此致謝。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lucklily.tw@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3.10.25；接受刊登日期：2014.04.03；最後修訂日期：2014.05.12

The Virtual Nostalgia Place, the Real Physical Memory — Li Ling's Gazebo Notes from Shangdu Traveling Poetry

Chia-yu Lee*

Abstract

Li Ling's gazebo notes were the most popular theme of traveling poetry in Yuan Dynasty. Comparing the works of Li Ling's gazebo in different times, the meanings were not the same. It was no longer an imaginative landscape where could not be reached, but a place everyone could visit. It was becoming a historical monument of memorability. However, whether the place of Li Ling's gazebo is the original one or not, people care more about the historical memory. Thus, the historical memory exists in the virtual nostalgia plac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uses cultural geography as the main reference to explore how the writers of Shangdu Traveling Poetry defined the place from their own viewpoints.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readers can review Shangdu Traveling Poetry from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the Yuan poetry, Shangdu Traveling Poetry, Li Ling, Li Ling's gazebo, cultural geograph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October 25, 2013; accepted April 3, 2014; last revised May 12, 2014

壹、前言

在邊塞書寫傳統中，李陵臺與昭君塚向來被認為是確定「異域」地方感 (the sense of place)¹的重要符號，如胡奎 (1331-?)〈邊城思〉的「草綠昭君塚，月白李陵臺」，²就以二者來指涉邊塞獨特的地方感。因為李陵 (?-74 BC) 與王嬙 (生卒年不詳) 都是漢帝國時期客死胡地，無法歸鄉之例，³李陵望鄉之高臺，昭君埋身之青塚，於是成為表徵胡地的代表性符號。而在李陵臺成為表徵胡地符號的同時，與李陵登臺望鄉相關的歷史記憶，也將銘記於李陵臺的符號之中，使其成為詠史的題材 (subject matter)，如姜夔 (1155-1221) 的〈李陵臺〉：「李陵歸不得，高築望鄉臺。長安一萬里，鴻雁隔年回。望望雖不見，時時一上來。」⁴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作為詠史題材或是邊塞符號，李陵臺在漢族王朝時代⁵始終都是無法到達的想像風景，⁶馬戴 (生卒年不詳) 的〈贈友人邊

¹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年)，頁15，「所謂的『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小說與電影（至少那些成功的作品）時常喚起地方感——我們讀者／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由此，即使從未到過某地，但經由閱讀／觀賞好的藝術作品，亦能讓讀者／觀眾知道，置身於該地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² 明·胡奎，〈邊城思〉，《斗南老人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卷6，頁9。

³ 李陵與王嬙是一種常見的連結，如元·方回，〈聞笛嘆〉，《桐江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頁18，即稱：「失身羈婦過昭君塚，債軍老將上李陵臺。」

⁴ 宋·姜夔，〈李陵臺〉，《白石道人詩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百部叢書集成：榆園叢刻)，卷上，頁4。

⁵ 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年)，頁44，「漢族王朝時代，國家係以漢族為主體，少數民族大多居處邊陲內外，與中原人民有明顯的地理區隔。」

遊回〉是少數提及登臨行動者：「遊子新從絕塞回，自言曾上李陵臺。尊前語盡北風起，秋色蕭條胡雁來」，⁷可以發現在這首詩中，雖然提及李陵臺的登臨，但卻是友人絕塞歸來後的「聽說」，也就是說在漢族王朝時代，李陵臺多被安置於國土地圖之外，遙遠、神秘與野蠻的異域。

在蒙元帝國時期，⁸帝國的領土如同許有壬（1287-1364）所指稱的「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於一」，⁹換言之，從前的異域如今都成為可以到達的國土。¹⁰然而，李陵臺在這個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並不僅僅只是被收納於帝國的內部，它還位居上京（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與大都（今北京）之間往

⁶ 所謂的想像風景，即通過臥遊所感知的風景，如同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政大中文學報》期 13（2010 年 6 月），頁 190，所指出的「從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看，臥遊也是一種了解自然、『接近』自然的方式。從作者的觀點說，創作臥遊作品，是『接近』未曾遊歷的山水的方式。」

⁷ 唐·馬戴，〈贈友人邊游回〉，《全唐詩》（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卷 556，頁 3383，作者之下有「一作薛能詩」之註。

⁸ 蒙元帝國時期與漢族王朝時代最大的區別在草原國家與中原王朝是合而為一的。蕭啟慶，〈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頁 23，指出「過去遊牧民族或則以『草原國家』及『邊境國家』的身分與中原王朝爭勝於邊陲」，換言之，在這種對峙時期，中原王朝與草原國家之間是有明顯的地理區隔，除了使節外，很少人能自由的穿梭於二者之間。但在元代，蒙古人兼有漠北、漢地與江南，包含驛站、海運、大運河等交通網的建立，讓帝國內部的往來交通暢行無阻，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 年），頁 145，曾以蒙元帝國的陸上交通網為例，認為「規模遍及中國全土的公共道路整備，至少是自唐代以來的首次」、「北起黑龍江及西伯利亞，南至越南、緬甸、西藏等東亞全境道路系統的整備，就目前所確認範圍內，是史上第一次」。

⁹ 元·許有壬，〈大一統志序〉，《至正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7），卷 35，頁 180。

¹⁰ 需要說明的是異域雖已成為國土，但這個地域對漢族文人而言，仍然充滿異域的陌生感，也就是所謂的「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參閱李嘉瑜，〈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空間書寫〉，《文與哲》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263-264。

來最頻繁的驛路上，¹¹以其命名的李陵臺驛，更是蒙古帝王兩都巡行¹²與官員行旅夜宿必經的場所，¹³李陵臺因而成為元代上京紀行詩最重要的寫作題材之一。上京紀行詩的主要書寫者，那些隨著蒙古帝王季節性的遷移，而被捲入旅行的空間移動與地理體驗的扈從官員們，在這年復一年固定的旅程之中，最感興趣的題材無疑是李陵臺。他們反覆書寫各自的凝視，如袁桷（1266-1327）有〈李陵臺〉二首與〈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四首，貢奎（1269-1329）有〈李陵臺〉與〈李陵臺次韻暢學士〉三首，胡助（生卒年不詳）¹⁴有〈李陵臺〉與〈再賦李陵臺〉；他們也相互唱和覆誦此一題材，如陳孚（1259-1309）有〈李陵臺約應奉馮昂霄同賦〉，許有壬有〈李陵臺謁左大夫〉二首，張鳴善（生卒年不詳）有〈李陵臺晚眺次吳真人韻〉等。除此之外，李陵臺書寫還呈現了跨越族裔的多重音聲，書寫者不但涵蓋帝國中原領土的南北地域，色目詩人馬祖常（1279-1338）、¹⁵迺賢（納新，1309-1368）、¹⁶高麗詩人李穀（1298-1351）¹⁷也都有以此為題的詩作。

¹¹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46，「驛路是一般官員及商人等來往兩都之間的主要通道」。

¹² 蒙元帝國施行兩都制，所以帝王必須定期巡狩於帝國的兩個都城，李嘉瑜，〈不在場的空間——上京紀行詩中的江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期18（2010年7月），頁52，「作為帝京之一，上京的作用在於有效的控制中原以外的蒙古世界帝國，所以元代帝王必須定期由大都歸返上京。」

¹³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37，「李陵臺驛站的規模大約不小，來往行人必在此處過夜。」不過這些行人必須是官方的人員，如同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頁253，所考述的「驛站是政府興辦的交通系統，專供政府使用，不許民間使用。乘騎驛馬或站船，使用車輛，要有官府的證明或諸王的令旨。」

¹⁴ 胡助的生卒年不詳，僅能由其〈純白先生自傳〉得知「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五年也」，至正五年為西元1345年。參見元·胡助，《純白齋類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叢書集選539），頁164。

¹⁵ 明·宋濂等撰，〈馬祖常列傳〉，《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43，頁3411，「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案：又譯汪古）部，居淨州天山」。蕭啟慶，〈元代蒙古族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128-129，嘗對汪古馬氏進行考

當代有關李陵臺書寫的研究成果不多，少數觸及者，亦是在以李陵歷史評議為主體的研究中旁及，如丁國祥〈論元詩對蘇武李陵的解析〉著意將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引入元詩對於蘇武(?-60 BC)、李陵之評議。其說認為「特定的時代引導詩人關注蘇李意象」、「歷史地看，忠於節者遠比慷慨意氣者為多；現實地看，元代統一後確實有不少名流忽略了氣節的要求。元代詩人正是看到這樣的事實，所以對蘇武李陵故事，才會有更多的吟嘆」，¹⁸這種思索其實是將元詩中蘇武、李陵大量出現的現象視為一種巨大的隱喻，藉此折射出漢族文人在異族統治之下的全節與辱身。這種論述或可觸及元詩的某些側面，但顯然無法用於上京紀行詩的詮說。因為上京紀行詩的書寫者，多是追隨蒙古帝王兩都巡行的扈從官員，作為蒙元王朝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異族統治之下的全節與辱身恐怕不是他們所關心的議題，¹⁹元詩中蘇武與李陵的大量出現，似乎更

察，認為「汪古為遼金以來居住陰山以北的突厥語部族。因其居處於草原與農業地區邊緣，與中原往來密切，其中早有漢文士人存在。」

¹⁶ 元·迺賢（納新），字易之，《元史》無傳。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3，頁38，考述其家世，「元人著述稱合魯易之，或稱葛邏祿迺賢。合魯，元譯，葛邏祿，唐以前譯，漢言馬也，故又稱馬易之。世居金山之西，元興，西北諸部仕中國者，隨便往居，故迺賢稱南陽人。」

¹⁷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428，有李穀小傳，「字中父，號稼亭，高麗人。至順三年秋，征東行省鄉試第一名，次年會試中第，殿試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明年奉勅勵學校詔使本省。往來於京師和高麗之間。」高麗·李穀，《稼亭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頁470-473，有題為「灤京紀行」的組詩八首，其中〈李陵臺〉詩，朝鮮著名的漢詩選本，如《青丘風雅》與《箕雅》都曾選入。

¹⁸ 丁國祥，〈論元詩對蘇武李陵的解析〉，《榆林學院學報》卷16期1（2006年1月），頁59-60。

¹⁹ 關於上京紀行詩書寫者身分認同之辨析，參見李嘉瑜，〈上京紀行詩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期14（2008年7月），頁22。此外，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邊塞詩風〉，《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多來自於李陵臺驛的往來者之眾。此外，上京紀行詩中的書寫者並不僅僅局限於丁國祥所指涉的漢族文士，丁氏在論文中用於舉證的〈李陵臺〉詩，其中列有迺賢與馬祖常之作，二者都是色目人，他們的族裔身分亦不適用於異族統治的種種思維。所以此篇論文雖然援引了許多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詩篇進行論題闡述，但由於忽略了其生產之背景與情境，因而無法契合上京紀行詩中李陵臺書寫的核心命題。又如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中「文人對李陵形象的呈現」一節，以「登臨『李陵臺』有感」為標題，依時代之序列，舉出相關詩作進行分析，並歸納總結——「在這一系的登臺之作，詩人所透露的，是對李陵思歸不得的無限同情」，²⁰換言之，其只想通過歷時性的觀察，印證詩人們對於李陵的態度是同情抑或批判。這種分析模式似乎過於簡化了李陵臺書寫的意涵，尤其將不同時代的李陵臺視為完全相同的存在物，都是詩人們登臨懷古的對象，於是漢族王朝時代身體無法到達的想像地景與蒙元帝國時期可以親身觀察的懷古場所，全都沒有了界線，而上京紀行詩中李陵臺書寫的獨特性，也在這種「一系列」的固定形式中被瓦解了。由上可知，目前有關李陵臺書寫的研究，由於都是旁及而非專論，所以各有側重的面向，因而無法展現李陵臺書寫的重要性與獨特性。

本文將以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為研究對象，²¹所謂的李陵臺書

科學版》2012年1期，頁28，亦指出「元上都扈從詩人大多屬於『勳閥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同盛唐時候投筆從戎，踐歷邊疆，渴望於邊疆建功立業的文人在身分、目的上有很大不同。」

²⁰ 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153。

²¹ 元代的李陵臺有二，一是位於唐單于都護府金河縣界的古李陵臺，一是位於兩京驛路上的李陵臺，詳細論述參見註25。元代李陵臺書寫之所以盛行，與其位於兩京驛路上，往來者眾多，有直接的關係。本文既以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為研究重心，故只著眼於後者。事實上，元詩中的紀行之作幾乎未見以古李陵臺為題者。

寫指涉的是以李陵臺為題材或背景者，當然也包括詩中提及李陵臺者。元代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至少有數十首，幾乎可以說是上京紀行詩中最受注目的題材，可惜目前的相關研究，僅只是旁及，而未針對李陵臺書寫進行專論。本文試圖以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為參考架構，探察上京紀行詩將如何建構李陵臺。²²作為邊塞詩與詠史詩中常見的「虛寫」風景，李陵臺在元代卻成為可以到達的「實寫」國土，從這個角度來看，元代的李陵臺書寫必然具有不同於漢族王朝時代的特質。元人究竟如何定義這個時代「可見」的李陵臺地景（landscape）？²³作為

²² 這一研究進路主要著重在觀看視角的移轉，藉此與目前上京紀行詩既有的研究成果有所區隔。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649，指出在元代「幾乎全部館閣詩人、有一定影響的文臣，都是『上京紀行詩』、『宮詞』的作者。在數十部詩集中都有成系列的類似冠以『上京紀行』、『上都雜詠』之題的組詩」；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2011年2期，頁141，更認為「上京紀行詩的繁榮是元詩典型特徵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由此可知上京紀行詩在元詩中的重要性。目前上京紀行詩的相關研究成果雖然不少，但多著重在確認其文獻價值與審美價值，前者如李軍，〈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2期，頁98，「上京紀行詩宏富的內容，對於我們了解元代的兩都巡幸制度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習俗，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劉宏英、吳小婷，〈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研究狀況及意義〉，《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24期4（2008年8月），頁11，「咏上都詩獨具特色，它不僅是研究上都歷史的珍貴資料，同時對研究我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等，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趙延花，〈從元代上都扈從詩看瀋陽民俗〉，《北方論叢》2012年6期，頁31，「扈從詩中表現的上都民俗豐富多彩，堪稱是元代上都民俗文化的長廊，具有重要的民俗學價值」。後者如李軍，〈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頁100，「上京紀行詩是人們以往意識中的邊塞地區的宮詞，它既有宮詞描寫細膩的長處，又兼有邊塞詩意境的雄渾蒼莽」；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審美價值簡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6期6（2005年6月），頁34，「這些詩既能展現草原的廣袤與蒼莽，也能描繪其中生機盎然的一草一木；既能粗筆勾勒恢弘之境，也能工筆刻畫細膩之景」。筆者認為上述的研究確實有其意義，但也有趨於一致的現象，因此希望透過觀看視角的移轉，為上京紀行詩尋求新的解讀方向。

²³ 「地景」的概念，目前已隨學者不同的使用的脈絡，日益複雜，本文對於「地景」的定義，採用 Sharon Zukin 的用法，指涉的「地景」是「它不僅代表一般常用的『實質

文學文本的上京紀行詩，又將對李陵臺進行怎樣的構形(configurations)？通過這種構形所再現(representation)的李陵臺，會展現何種特質呢？如能深化與補實這些研究面向，或能為上京紀行詩與李陵臺書寫揭示更為清晰的認識路徑。以下我們就圍繞著上述提問，展開討論。

貳、從想像地理到京城勝景——元代李陵臺地景的意義

元代李陵臺的地理位置在「今正藍旗西南的黑城子」，²⁴與「在唐單于都護府金河縣界」²⁵的古李陵臺是不同的，上京紀行詩所提及的李陵臺

環境』地理意義，也指涉物質與社會實踐及其象徵再現的總合」。參見 Sharon Zukin 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年)，頁19。此外，林宛瑄，〈理性眨眼的瞬間——《哈利波特》中流動的想像地景〉，《英美文學評論》期14(2009)，頁154-155，曾引用 Barbara Bender 的說法，「班德爾指出，地景一詞常被所謂西方菁英傳統解讀為加諸於地物全景的『觀點』，強調俯瞰以盡納全貌的良好視角，以及凝定的『靜態』景觀，因此在這樣的想像中，觀者總是『後退一步』遂行其目視及觀看的權利。班德爾認為，菁英傳統對地景的詮釋太過狹隘，甚至不過是幻視，完全忽略了人如何在此時此地與所謂周圍的物質世界相接合；因此她認為地景應是一種過程，隨著人的感知與互動反應而時移景易」，也就是說重點在「感知」，而非「看到」，所以可以有消費地景、權力地景、神聖地景、想像地景等用法，這些正是對於 Tim Cresswell 「地景是指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的局部地球表面」這類傳統說法，所提出的回應與反思。Tim Cresswell 之說，參見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9。

²⁴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37。賈敬顏，〈王恽〈開平紀行〉疏證稿〉，收入葉新民、齊木德道爾吉編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86，亦持相同看法，「俗說，今正藍旗以南黑城子是其故址。《明太宗實錄》卷七十一永樂八年七月戊辰，改開平李陵驛為威虜驛。」

²⁵ 元·耶律鑄，〈發涼陁偏嶺南過橫山回寄淑仁〉，《雙溪醉隱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133)，卷3，頁608。耶律鑄在此詩的子注中，明白標出有古今二種李陵臺。古李陵臺據耶律鑄所言「在唐單于都護府金河縣界」，高建新，〈唐詩中的「金河」〉，《內蒙古大學學報》卷42期5(2010年9月)，頁82，考證出「無論金

皆指前者，因為元代李陵臺書寫之盛與李陵臺驛有密切關係。當時往來大都與上京的驛路，²⁶必然會經過以李陵臺命名的李陵臺驛，「李陵臺驛站的規模大約不小，來往行人必在此處過夜」。²⁷而其與上京之間，只隔桓州一站，²⁸元人稱「此地去上京百里許」，²⁹換言之，在這條聯絡兩都的驛路上，過了李陵臺，上京其實就不遠了，所以李陵臺也被納入京城勝景的範圍中。³⁰

直到十二世紀末期，無論是古李陵臺還是元代的李陵臺，它們所在的地區都還屬於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³¹的一部分，是漢族王

河、金河泊還是金河縣，三地相距甚近，均在今天呼和浩特南部境內」，也就是說古李陵臺應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地區。又據高建新所言，「金河地處朔北，背靠黃河，面對陰山的主峰大青山，是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地」（頁 82），而位居金河縣界的古李陵臺更是漢族王朝時代難以到達經驗之地。

²⁶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33，「元代一般人赴上都多經由驛路，驛路實際上成為兩都間最重要的交通幹線。」

²⁷ 同前註，頁 37。

²⁸ 元·熊夢祥，〈天下站名〉，《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24，列出大都至上京的驛站，「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榆林（西行至統幕分二路：一路北行至上都；一路西行至雷家站）；往上都者，續接「（正北轉東八十）鵬窩（正北偏東八十）赤城（八十）獨石（東北八十）牛羣頭（六十）明安（六十）李陵臺（正西三十六站入和林），桓州，至上都。」

²⁹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上，頁 3 下，第 24 首子注。

³⁰ 「陵臺晚眺」為灤京八景之一，詳細論述參見註 56。

³¹ 想像地理是 Edward W. Said 所提出的理念，參見 Edward W. Said 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郭莞玲、游美惠、游常山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頁 75-76，「凡是人為疆界，用『我們一國／野蠻人一國』的二分法來分類想像中的地理，從來都不需要等到『他們野蠻人』認可。『他們』之所以是『野蠻的異類』，原因就在他們的疆界和心態，都不同於我們的。某種程度而言，無論現代或原始社會，都是以此『非我族類』的負面思考方法，找到集體認同」、「地理區域會伴隨著該社會的倫理觀、可以預期的文化表現方式，而形成自己『並非異類』的定見。而這種觀念、感受，就是建立在一個事實：所有的假設、連結、幻想都是起源於：在

朝時代經驗世界的地圖以外的外界 (outside)，然而，「運用『大漢圖騰』來勾勒對漠北塞外之想像」³²的邊塞詩則提供了有關這些地域的知識，如塞垣、翰海、荒磧、天山、交河、樓蘭等，這些地名意味著一種異域情調。在漢族王朝時期，通過閱讀與想像，許多未曾到過邊塞的詩人，也能書寫邊塞詩，³³但他們所描繪的塞外之地顯然是一個文本化的世界，而非透過實際的觀察與經驗所建構的。

蒙古帝王的兩都巡幸，將上京紀行詩中的書寫者們帶入了漢族王朝時代邊塞之外的異域，旅程中移動的塞外風景喚起了觀景者的情感，「今予所歷，又在上谷、漁陽、重關大漠之北千餘里，皆古時騎置之所不至，轍迹之罕及者」，³⁴「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³⁵可以發現有關異域

疆界外的那邊，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將這種理念對應古代中國的地理想像應該是相應的，如同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44，所指出的「在古代中國的想像中，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裡的民族也就越野蠻，文明的等級也越低」，可知古代中國對於異域亦存在著所謂的想像地理。

³² 王文進，〈盛唐邊塞詩的真幻虛實——論南朝詩人時空思維對盛唐邊塞詩形式的規範〉，《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201。

³³ 王文進曾以南朝邊塞詩為例，對於邊塞詩的這種「虛寫」特質有深刻的辨析，如同氏著，《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45-46，所指出的：「即使是大漠風沙，邊城胡笳，詩人也可以『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在杏花煙雨的江南隨手揮灑視野遼闊的大漠想像。」此外，王文進，〈盛唐邊塞詩的真幻虛實——兼論南朝詩人時空思維對盛唐邊塞詩形式的規範〉，《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231，亦針對唐代邊塞詩這種「虛寫」的現象進行討論，並認為「縱使詩人未至邊塞，卻仍然可運用文學歷史之累積，對千里之外實際存在的塞外風光，融合歷史的詠懷，進行想像的虛寫。」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頁190，則在王文進的基礎上，將邊塞詩的這種「虛寫」，稱之「臥遊」，亦可參看。

³⁴ 元·周伯琦，〈後序〉，《扈從集》，與《近光集》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四庫全書珍本二集），頁11。

³⁵ 元·危素，〈贈潘子華序〉，《危太樸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8，頁451。

的知識，以各種形式獲得補充，完整地真實起來。除了真實之外，上京與李陵臺所在的地區，其所表徵的地景意義也發生了變化。如馬祖常〈北歌行〉所展示的：

君不見李陵臺，白龍堆，自古戰士不敢來。黃雲千里雁影暗，北風裂旗馬首回。漢家衛霍今何用？見說軍還如裹痛。不思百口仰食恩，豈念一身推轂送？如今天子皇威遠，大磧金山烽燧鮮，却將此地建陪京，灤水回環抱山轉。萬井喧闐車戛輪，翠華歲歲脩時巡，親王親主荊玉盡，侍臣朝紱蠙珠新。高昌勾麗子入學，交趾蠻官貢麟角。斗米三錢金如土，國人謳歌軍將樂。軍將樂，四海清。吾皇省方豈田獵，觀風察俗知太平。³⁶

在這首詩中，空間是在固定於「李陵臺」、「白龍堆」所指稱的塞外異域，「黃雲千里雁影暗，北風裂旗馬首回」的景色描繪仍然依托於我們所熟悉的邊塞書寫，但時間卻被分隔為二，其一的時間是過去，過去的「李陵臺」、「白龍堆」是「自古戰士不敢來」的恐懼投射之地。其二的時間是現在，「如今天子皇威遠，大磧金山烽燧鮮，却將此地建陪京，灤水回環抱山轉」，可以發現這個地區被納入了京城的範圍，這樣的定位，促使了中心與週邊的重新劃分，如同吳師道（1283-1344）所稱的「穹廬敕勒秋風曲，青塚嬋娟夜月魂。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須論」。³⁷在中國傳統的空間觀中，「大地彷彿一個棋盤一樣，或者像一個回字形，四邊由中心向外不斷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華夏或者諸夏」，³⁸換言之，上京的京城位置改變了李陵臺的地景意涵，景觀可以是

³⁶ 元·馬祖常，〈北歌行〉，《馬祖常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元代文集叢刊），卷5，頁136。

³⁷ 元·吳師道，〈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十首之七，《吳師道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元朝別集珍本叢刊），卷8，頁143。

³⁸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頁44

邊塞書寫中可知的塞外風景，如同馬致遠（1250-1321）被稱為上京紀行詞³⁹的「沙漠小詞」⁴⁰所表述的：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⁴¹

其他如「李陵遺跡草連天」、⁴²「李陵臺畔野雲低，月白風清狼夜啼。健卒五千歸未得，至今芳草綠萋萋」⁴³等，都展示了典型的塞外風景，然而，貢師泰（1298-1362）〈灤河曲〉所言的：「椎髻使來交阯國，橐駝車宿李陵臺。遙聞徹夜鈴聲過，知進六宮瓜果迴」，⁴⁴卻也顯示當交阯向中心之國朝貢，六宮瓜果的北送往返，都以李陵臺作為連結的標誌，很顯然，這個以前被視為邊緣的塞外地景，現在是離中心很近的區域。

在上京紀行詩中，李陵臺地景還經常被描述為一種荒頹的景象，如「漢將荒臺下，灤河水北流」、⁴⁵「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⁴⁶「前坡

³⁹ 此說首見於孫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33，「『李陵臺』乃大都上都間站赤」、「李陵臺之名，至清猶存。以是言之，則致遠〈天淨沙〉三首，乃上都紀行詞也」；楊鐮，《元詩史》，頁645，亦同意這種看法，「這三首小令正是『上京紀行詞』。它們不但是『秋思之祖』，也是『上京紀行詩』的和弦。」

⁴⁰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中下，頁15，其稱「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除所引之例，另兩闋亦是馬致遠的〈天淨沙〉，「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⁴¹ 同前註。

⁴² 高麗·李穀，〈灤京送別一首用閔及菴詩韻〉，《稼亭先生文集》，頁472。

⁴³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卷上，頁3下。

⁴⁴ 元·貢師泰，〈灤河曲〉之一，《玩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卷5，頁12。

⁴⁵ 元·周伯琦，〈紀行詩·李陵臺〉，《扈從集》，與《近光集》合刊，頁6。

⁴⁶ 元·黃潛，〈李陵臺〉，《黃潛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冊上，頁18。

聳頽基，云是望鄉臺」、⁴⁷「今古李陵愁絕處，夕陽野牧下荒臺」、⁴⁸「李陵行處莽平原，祇見荒臺思愴然」⁴⁹等，令人好奇的是元人如何確認這塞外的荒臺（荒山）與漢將李陵之間的關係呢？耶律鑄（1221-1285）〈發涼陁偏嶺南過橫山回寄淑仁〉的「想得玉灤河北畔，有人獨上李陵臺」⁵⁰子注嘗記此事：「土俗呼為李陵臺者，在偏嶺東北百里，李陵失利在無定河外，意其好事者名其山為李陵臺也」，⁵¹柳貫（1270-1342）〈望李陵臺〉亦稱「俚言雖莫稽，陳跡尚可訪」，⁵²這揭示了元人是因為李陵失利於無定河外，所以經由「好事者」與「俚言」的指認，將兩京旅程中的荒臺（荒山）與李陵進行連結，於是無意義的荒臺（荒山），通過命名的儀式，⁵³成為了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

⁴⁷ 元·袁桷，〈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袁桷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卷15，頁258。

⁴⁸ 元·貢奎，〈李陵臺次韻暢學士〉之一，《貢文靖雲林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3），卷10，頁683。

⁴⁹ 元·張嗣德，〈陵臺晚眺〉，收入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冊下，頁1362。

⁵⁰ 元·耶律鑄，〈發涼陁偏嶺南過橫山回寄淑仁〉，《雙溪醉隱集》，卷3，頁608。

⁵¹ 同前註。

⁵² 元·柳貫，〈望李陵臺〉，《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2，頁18。

⁵³ 在文化地理學的理論中，命名向來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儀式，如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9，所言的「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譯，〈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頁50，「替地理實體命名的這個動作，便意涵了凌越其上的權力，尤其是關於這些地方、居民及其社會功能被呈現的方式的權力。」

作為記憶性古蹟，⁵⁴這虛擬的場所仍然密佈著等待回憶的名字與事件，李陵、蘇武(?-60 BC)、漢武帝(156 BC-87 BC)、司馬遷(135 BC-86 BC)、浚稽之役、河梁之詠、築臺望鄉，逐漸繁生出蛛網般的路徑，召喚書寫者在此進行懷古的紀念儀式，而且「後人如果願持續而積極地回憶該事件，並由其中尋求意義，該歷史記憶便產生擴延，而此古蹟便將得以持續地存在」，⁵⁵由「陵臺晚眺」與「鳳閣朝陽」、「龍岡晴雪」、「敕勒西風」、「烏桓夕照」、「灤江曉月」、「松林夜雨」、「天山秋獵」一起被框定為灤京八景，⁵⁶以及整個元代接續不斷的詩歌吟詠，可知這個地方是否真為李陵望鄉的場所已不再重要，因為藉由文學性的「品題」，⁵⁷李陵臺已經成為上京富有文化意義的勝景。換言之，真實的歷史記憶就這樣附

⁵⁴ 石守謙，〈史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期 92（1993 年 12 月），頁 14，指出記憶性古蹟「因其獨特性極高，甚至可以容許在正確度上作最寬鬆的處理，或者，根本不顧其限制」。石守謙將古蹟區分為「記憶性古蹟」與「史料性古蹟」，前者著重在其中蘊含的歷史文化記憶，古蹟的存廢與正確度，可寬鬆處理；後者的關心在建物本身的空間構造與使用經驗是否被忠實的留存，至於其是否能勾起歷史文化記憶，並非重心。

⁵⁵ 石守謙，〈史蹟·史料·記憶·危機〉，頁 16。

⁵⁶ 李嘉瑜，〈宮城與廢墟的對視——元代文學中的大安閣書寫〉，《文與哲》期 21（2012 年 12 月），頁 270，曾藉由張嗣德〈灤京八首〉與揭傒斯的〈烏桓夕照〉、〈灤河曉月〉、〈松林夜雨〉、〈天山秋獵〉、〈陵臺晚眺〉等詩，對照二者的標目，確認灤京八景在元代應是已經框定的風景命題。張嗣德的〈灤京八首〉，可參見《元詩選癸集》，冊下，頁 1361-1362；揭傒斯的相關諸作，則見於《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詩集卷 7，頁 198-200。

⁵⁷ 石守謙，〈導論——由文化意象談「東亞」之形塑〉，《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2），頁 24，認為西湖十景與瀟湘八景都經過由自然風景到具文化意涵名勝的轉化過程，而促使其發生改變的就是「品題」，「經由士人的參與，名勝本有的特定風景、歷史記憶等要素被充分地整合，並藉由文學性的『品題』程序，西湖與瀟湘便脫胎換骨似地罩上一層超凡的精神意義。」

著於虛擬的懷古場所中，讓元代兩京旅程中的荒臺（荒山）接收了李陵與李陵臺的相關記憶，進而豐富了自身的文化意義。⁵⁸

參、李陵臺書寫的歷史記憶

不管李陵臺的真偽如何，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無可避免的必須收納有關李陵與李陵臺的記憶，進而以文學書寫的形式參與李陵其人其事的評述，以下我們將通過「悲劇英雄形象的強化」、「李陵事件的評議」這兩個側面，解讀在上京紀行詩中，元人如何記憶與書寫李陵。

一、悲劇英雄形象的強化

事實上，李陵悲劇英雄的形象，並不僅見於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一般認為李陵悲劇英雄的原型，主要提煉自班固（32-92）的《漢書》與蘇李詩。關於前者，何寄澎曾有詳細的考察，其說認為《漢書》對李陵書寫的重要意義在於「就對人物的觀點而言，班固自始至終形塑的是李陵英雄的形象，而且是極典型的悲劇英雄形象」、「對李陵曲折的心境有極生動細膩的刻畫」，⁵⁹至於後者，朱曉海在〈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中指出「蘇、李名下的這些書信與那些詩都是以《漢書》為土壤，孕育而出，卻形成鮮明對照。詩流露的李陵心緒主要在自傷，而且自傷的

⁵⁸ 關於文化地景這種虛實結合的情形，唐曉峰，《文化地理學釋義——大學講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頁190，曾以《西廂記》與山西永濟市的普救寺、金庸小說中華山論劍與華山的結合，通過二例進行分析，認為「原來是虛構的故事，附會在真實的地方，它借助這個地方活了起來，並保存了下去」，可知這種虛實結合的情形，在文化地景中是相當普遍的。元代的李陵臺則正好與唐曉峰所引之例形成對照，是虛擬的場所與真實的歷史記憶之結合。

⁵⁹ 何寄澎，〈《漢書》李陵書寫的深層意涵〉，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163。

實際內容不外思歸不得的痛苦、失群的孤寂、懷人的殷切三個面向」，⁶⁰就此而言，《漢書》著重在李陵於政治與軍事事務中的悲劇命運與複雜曲折的心境，蘇李詩則側重於李陵「欲歸不得」的自傷，二者共同形構了能引發士人同情共感的悲劇英雄李陵，「至晚在東晉末葉，李陵作為一淒愴符碼已經完全確立」。⁶¹值得注意的是當悲劇英雄李陵在各類藝文作品中被反覆臨摹與複製時，⁶²李陵其實已進入所謂的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中，成為一個符號。Jan Assmann 認為「文化記憶有其自己的固定點，它的視野不隨向前推進的當今點而變動。這些固定點乃是過去的命運性事件，人們通過文化造型（文字材料、禮儀儀式、文物）和制度化的溝通（朗誦、慶祝、觀看）依然保持著對這種過去的回憶」，⁶³而上京紀行詩所進行的也是這種對於李陵的文化造型。

在欲歸不得的哀傷方面，上京紀行詩亦持續關注於此，如袁桷的〈李陵臺〉之二：

⁶⁰ 朱曉海，〈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古典文獻研究》輯 14（2011 年 6 月），頁 29。

⁶¹ 同前註，頁 59。

⁶² 除了詩文作品外，變文中有〈李陵變文〉、〈蘇李執別詞〉；戲曲作品有〈牧羊記〉、〈雁書記〉、〈河梁歸〉等，小說作品有《雙鳳奇緣》。此外，藉由元代題畫詩如戴表元的〈蘇李圖〉、〈蘇李泣別圖〉二首，揭傒斯〈題送蘇武圖〉三首、柳貫〈題李藻《河梁泣別圖》〉、范梈〈蘇李會合圖〉、江垕〈李陵泣別圖〉等，亦可以推測蘇李圖是元代常見的人物畫主題，其中李陵的形象亦是指向悲劇英雄，如元·江垕，〈李陵泣別圖〉，《元詩選癸集》，冊上，頁 673，所展示的，「黃雲黯將暮，白日寒無暉。送客度河梁，惆悵難別離。胡馬雖善行，按轡姑遲遲。初心孰余察，後罪甘誅夷。君老既堪去，我乃無家歸。陽春滿皇都，長負平生期。」

⁶³ Jan Assmann,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in Jan Assmann and Tonio Hölscher (eds.), *Kultur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88), p.12, 轉引自 Angela Keppler 著，〈個人回憶的社會形式——（家庭）歷史的溝通傳承〉，收入 Harald Welzer 編，季斌、王立君、白錫堃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02。

雪衰黃沙風衰灰，眼穿猶上望鄉臺。隴西可是無迴雁，不寄平安一字來。⁶⁴

首句便就外在世界的自然景物切入，那片淒涼迷濛的塞外場景，是袁桷此刻所見，也是當年李陵望眼欲穿的所在。然而，不只所望的故鄉渺茫難見，連能捎來鄉信的「迴雁」，都「不寄平安一字來」，更顯鄉愁的煎熬。值得注意的是上京紀行詩在表述李陵這種欲歸不得的哀傷時，受到李陵臺書寫主題的限制，每每將焦點放在「望」的動作，如「可望不可到，血淚墮汪漾」、⁶⁵「登臺望漢地，山川眇如許」、⁶⁶「誰為削平山，望見長安陌」⁶⁷等，欲歸不得的「望」也就成為元人在刻畫李陵哀傷時被記憶的關鍵點。

在多舛的悲劇命運方面，上京紀行詩更強調的是一種事與願違的悲感，如色目詩人迺賢的〈李陵臺〉：

落日關塞黑，蒼茫路多歧。荒烟澹漠色，高臺獨巍巍。嗚呼李將軍，力戰陷敵圍。豈不念鄉國，奮身或來歸。漢家少恩信，竟使臣節虧。所愧在一死，永為來者悲。千載撫遺跡，憑高起遐思。褰裳覽八極，茫茫白雲飛。⁶⁸

⁶⁴ 元·袁桷，〈李陵臺〉之二，《袁桷集》，卷15，頁255。

⁶⁵ 元·陳孚，〈李陵臺約應奉馮昂霄同賦〉，《陳剛中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02），卷3，頁1202-658。

⁶⁶ 元·馬臻，〈李陵臺懷古〉，《霞外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四庫全書珍本十集），卷3，頁20。

⁶⁷ 元·陳宜甫，〈李陵臺〉，《秋巖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02），卷上，頁1202-680。

⁶⁸ 元·迺賢（納新），〈李陵臺〉，《金臺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407），卷2，頁27。

這首詩中，李陵的「力戰陷敵圍」表現了他欲報國的苦心，而抱負未成在於「漢家少恩信，竟使臣節虧」，「豈不念鄉國，奮身或來歸」的反詰，則點出其內裡的思歸睠顧，而人生的悲感就在這種事與願違的衝突中透顯，即使認為李陵「所愧在一死」，但他的無奈與悽愴，仍是「永為來者悲」。

高麗詩人李穀在〈李陵臺〉一詩中，對於李陵亦有類似的造型：

許國身何有，成功命不侔。漢皇雖好武，飛將未封侯。苦戰知無賴，生降亦可羞。高臺啣落日，為爾故遲留。⁶⁹

所謂的「許國身何有，成功命不侔」，正說明了「許國」是李陵的理想，「不侔」則是命運無情的撥弄，金宗直（1431-1492）評述此詩，認為：「李陵與王昭君俱失身於胡虜，然而前後詞人詠其事，率不嘲刺，而反以吊慰，豈非以其命與時有可哀也，而其志或有可取歟」，⁷⁰換言之，「不能死」一事反而更突顯了命運的撥弄與李陵深刻的憾恨。所以不論是「赴死寧無勇，偷生政有為」、⁷¹「勇奮功名嗟不遂，從容就死古稱難」，⁷²這類對李陵「求生」的辯護與諒解，還是對於其「不能死」的惋惜與遺憾，如「早知死敵全忠義，誰復悲傷倚暮天」、⁷³「歸無面目見君王，將身未免降勅敵」，⁷⁴其實都在強化上京紀行詩中李陵悲劇英雄的形象。

⁶⁹ 高麗·李穀，〈李陵臺〉，《稼亭先生文集》，頁 471。

⁷⁰ 朝鮮·金宗直，《青丘風雅》（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409。

⁷¹ 元·貢奎，〈李陵臺〉，《貢文靖雲林集》，卷 7，頁 669。

⁷² 元·唐元，〈李陵臺懷古〉，《筠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3），卷 6，頁 24。

⁷³ 元·揭傒斯，〈陵臺晚眺〉，《揭傒斯全集》，詩集卷 7，頁 200。

⁷⁴ 元·陳宜甫，〈李陵臺〉，《秋巖詩集》，卷上，頁 1202-680。

二、對於李陵事件的評議

由於多以悲劇英雄的角度來解讀李陵，上京紀行詩有關李陵事件的評議，無疑是較為寬容的，如貢奎的〈李陵臺〉：

赴死寧無勇，偷生政有為。事疑家已滅，身辱義何虧？漢網千年密，河梁五字悲。荒寒迷宿草，欲問竟誰知。⁷⁵

這首詩開頭兩句就以直敘筆調點出作者對李陵的同情，「無勇」、「偷生」是表面所見，「赴死」、「有為」才是李陵真正的本質。接著，「事疑家已滅，身辱義何虧？」則是針對命運無情的撥弄，提出不平的控訴。「漢網千年密，河梁五字悲」透顯出李陵悲劇的無奈與憾恨。最後兩句收束於李陵臺週遭「荒寒迷宿草」的景觀以及「欲問竟誰知」的感慨。身為入元後「較早進入翰林院的南人之一」，⁷⁶貢奎對於李陵「身辱義何虧」的寬容，或也相當程度地呼應著自身的處境。

此外，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於李陵事件的看法，也影響了元人的認識與評判，如出於西域雍古部的色目詩人馬祖常，他的〈李陵臺〉二首是這樣說的：

故國關河遠，高臺日月荒。頗聞蘇屬國，海上牧羝羊。

蹄林聞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⁷⁷

這兩首詩的用筆寓意俱在為李陵鳴不平。第一首的前兩句將李陵臺安置在「關河遠」、「日月荒」的廣漠時空中，後二句表面寫蘇武羈北事，只是蘇武的「海上牧羝羊」，竟只換得官卑祿薄的典屬國一職，作者個人的批判也就隱含其中。第二首的「蹄林聞野祭，漢室議門誅」透過匈奴

⁷⁵ 元·貢奎，〈李陵臺〉，《貢文靖雲林集》，卷7，頁669。

⁷⁶ 楊鐮，《元詩史》，頁401。

⁷⁷ 元·馬祖常，〈李陵臺〉二首，《馬祖常集》，卷4，頁92。

與漢室之間厚恩寡義的對比，迫使讀者去思考李陵所面對的處境。末二句以感慨收筆，「辛苦」、「淒涼」表露出作者對於李陵與司馬遷的深切同情，而「樓蘭將」一詞中暗含的「不破樓蘭終不還」，⁷⁸呈示的是李陵的志意，對照他乖舛的命運，更顯英雄生命的淒涼與無奈。馬祖常此處對李陵的評議，顯然是接近司馬遷的。

事實上，在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中，司馬遷經常被標舉出來，如「常憐司馬公，予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⁷⁹「昂昂司馬生，義色興壯懷。子卿固偉節，屬國何低徊」，⁸⁰既然認為司馬遷為李陵所作的發言是「論錄存大義」、「義色興壯懷」，自然也影響了他們對於李陵事件的評論。換言之，元人的李陵臺書寫經常在對司馬遷的肯定中，延續與深化其〈報任安書〉與班固《漢書》⁸¹以降的觀點。

藉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李陵其人其事在元代繼續被記憶與書寫，其中有繼承此一書寫主題歷時性的關注焦點者，如形塑李陵的文化造型，強化其悲劇英雄的姿態，亦有反映當代的特色者，如欲歸不得的「望」與普遍寬容的態度。

⁷⁸ 唐·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四，《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1，頁47。

⁷⁹ 元·黃潛，〈李陵臺〉，《黃潛全集》，冊上，頁18。

⁸⁰ 元·袁桷，〈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袁桷集》，卷15，頁258。

⁸¹ 何寄澎，〈《漢書》李陵書寫的深層意涵〉，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頁168，指出「班固的李陵書寫是為司馬遷寫的，是完全站在司馬遷的認知觀點去寫的」，可知《漢書》中的李陵書寫完全是以司馬遷的觀點為主。

肆、李陵臺空間書寫的特色

作為上京被框定的典範風景之一，李陵臺與元人之間的關係已從漢族王朝時代透過想像的「臥遊」⁸²轉變為「親臨」的經驗，書寫者在李陵臺中透過身體感官所展示的空間體驗，將迥異於之前的李陵臺書寫，因為「在書上讀到或在畫裡見到的過往呈現，是一回事，但是進入『地方中的歷史』（history-in-place）領域，完全是另一回事」。⁸³作為當代勝景與記憶性古蹟，書寫者在李陵臺思想過去，把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帶入現在，另一方面又在這裡經驗著個人記憶（personal memory）。通過這面特殊的透鏡中，李陵臺將如何被書寫者感知，這是本節所欲探索的重點。

一、悲淒的地方感

在上京紀行詩中所再現的李陵臺，包括其周遭的風雲草木，恆常籠罩在一種悲淒的氛圍中，如馬臻（1254-?）⁸⁴的〈李陵臺懷古〉：

在昔李將軍，提師奮威武。步卒五千人，縱橫盡貔虎。謀猷始欲成，管敢摧一語。漢恩既未報，肝膽日益苦。豈知萬里外，骨肉膏草莽。昭帝固任賢，義斷難復取。登臺望漢地，山川眇如許。

⁸² 本文對於「臥遊」一詞的定義，以葉國良的說法為據，參見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頁 181，「把自己想像所見用文字描繪出來、有情景細節的作品，此類作品才適合稱之為『臥遊文學』。但此類應該還可以按照想像成分的多寡再分成兩種：一種是依據文獻記載努力組織其想像所得，力求符合現實；一種雖然並非沒有依據但重點在任其想像力馳騁，以達到臥遊的最大滿足」。

⁸³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38-139。

⁸⁴ 王樹林，〈元道士馬臻《霞外詩集》及拾遺〉，《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輯 1（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81，認為馬臻「最少活了七十三歲，馬臻卒年應定於泰定三年丙寅（公元 1326 年）以後為宜。」

北風吹不消，恨入臺下土。我行青山下，矯首一懷古。復笑秦家城，聳環列遺堵。惟有山上雲，淒迷送秋雨。⁸⁵

這首五言古詩以敘事的筆法細寫李陵一生的際遇，從李陵當年的壯志、偷生忍辱的苦衷，到預想的後果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尖銳對比，可以發現，悲劇英雄李陵仍然是這個地方最深刻的歷史記憶，Tim Cresswell 認為「創造地方感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關注特殊且經選擇的歷史面向」，⁸⁶當書寫者將李陵定位為悲劇英雄，李陵「骨肉膏草莽」、「義斷難復取」的悲憤與憾恨就與這個地方緊密連結，「北風吹不消，恨入臺下土」，更清楚地揭示鬱結在李陵心中，連北風都化不開的恨意，就這樣固執地滯留在李陵臺，無法散去。千年之後，旅人「矯首一懷古」，山雲秋雨所營造出的「淒迷」氛圍，正是書寫者所感受到的固著於此地的地方感。馬臻是宋元易代之後，出家為道士的士人，「隱於西湖之濱，肆力吟咏，與仇遠等南宋遺民相唱酬」，⁸⁷大德五年（1301）五月的上京行，對他而言是充滿客愁與積鬱的，這種身世之感似乎也影響了他對於李陵臺地方感的形塑。

事實上，這種悲劇英雄的身影與淒迷地景的連結，在李陵臺書寫中可以說是非常普遍的，如「安知臣節恭，之死不易諒」的李陵與「李陵思鄉臺，駐馬一西向。草根含餘淒，峰尖入寒望」、⁸⁸「臣豈負朝廷，忠義夙所尚」的李陵與「可望不可到，血淚墮汪洋。空有臺上石，至今尚西向」⁸⁹、「英雄不死非無意，空遣歸魂故國來」的李陵與「路出桓州山

⁸⁵ 元·馬臻，〈李陵臺懷古〉，《霞外詩集》，卷3，頁20。

⁸⁶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38。

⁸⁷ 王樹林，〈元代正一教馬臻、陳義高、朱思本詩文集論考〉，《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25期5（2009年9月），頁63。

⁸⁸ 元·柳貫，〈望李陵臺〉，《柳貫詩文集》，卷2，頁18。

⁸⁹ 元·陳孚，〈李陵臺約應奉馮昂霄同賦〉，《陳剛中詩集》，卷3，頁1202-658。

縵迴，僕夫指是李陵臺。樹遮望眼仍相弔，雲結鄉愁尚未開」，⁹⁰在這裡，李陵將永遠停留在悲劇時刻，而李陵臺則是這些歷史記憶延伸出去的地方，眼前所看見聽見的風聲、雲影、草木、峰巒、高臺、碑石……等，都成了千年前的悲劇在現在的投影，透過這樣的凝視所篩出的風景片段，也就不得不籠罩在悲淒的氛圍中，而這正是書寫者賦予李陵臺的獨特地方感。

二、當時與現在之間的對照

懷古場所原就具有當時（then）與現在（now）兩種時序關係，所以在空間書寫中二者時常形成固定的對照，藉此突顯時間的無常，「不管是古城、石碣、樓臺或名園，都通過時流的沖汰而遺留下來。但這些存留並不能給人任何的安慰，詩人依然喟歎『空』」，⁹¹在上京紀行詩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呈現，如黃潛〈李陵臺〉的「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憩。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低徊為之久，懷古增歔歔」，⁹²在此，現在的李陵臺已成蕪廢荒涼的遺跡，但「荒臺」仍在，當時登臺望鄉的李陵卻早已消逝在時間的洪流中，詩人的「低徊」、「歔歔」，無非是一種物是人非的感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照不必然引向訪古所興發的無常之悲，很多時候，書寫者只是用它來揭示現象世界中的今昔變遷，如胡助的〈再賦李陵臺〉：

⁹⁰ 元·張翥，〈過李陵臺〉，《蛻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卷5，頁1。

⁹¹ 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的結構模式與生命開解〉，《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222。

⁹² 元·黃潛，〈李陵臺〉，《黃潛全集》，冊上，頁18。

李陵臺畔秋雲黃，沙平草軟肥牛羊。當時不是漢家地，全軀孛戮寧思鄉。塞垣西北逾萬里，此去中原良邇止。安得有臺灤水測，好事千古空相傳。可憐歸期典屬國，雪埋幽窖無人識。⁹³

在這一首詩當中，遍佈著時空對比。這個地方，「當時不是漢家地」，然而，一千年過去了，在「沙平草軟肥牛羊」的現在，它也被推移到帝國版圖之內。在李陵登臺望鄉的當時，這裡是「塞垣西北逾萬里，此去中原良邇止」的異域，現在卻是「安得有臺灤水測，好事千古空相傳」的京城勝景。可以發現重返歷史現場的行動，並不必然帶來傷懷，書寫者也可以客觀的敘說他所觀察、經驗到的時空變化。

在張嗣德(?-1352)的〈陵臺晚眺〉中，這種變化更被指向對於帝王與盛世太平的頌揚：

李陵行處莽平原，祇見荒臺思愴然。野日斷鴻空送晚，塞雲歸鶴不知年。千重牙帳開周後，萬里長城啟漢前。雅調早傳來魏闕，賡歌尚擬頌堯天。⁹⁴

在這裡，亦可看到今古時空的對比，李陵當年所行之處如今只剩寂寥荒臺，「塞雲歸鶴不知年」的時移事往，卻讓此地成為蒙古帝王「千重牙帳開周後」的歲巡必經之處，並由此引出「雅調早傳來魏闕，賡歌尚擬頌堯天」這類對於帝王盛德與太平盛世的頌美。張嗣德是正一道第四十代天師，「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教事」，⁹⁵扈從上京，應有元廷的政治考量，而張嗣德亦必須對當政者有所回應。不只〈陵臺晚眺〉，他的〈京京八首〉都是對盛世的讚揚。

⁹³ 元·胡助，〈再賦李凌臺〉，《純白齋類稿》，卷5，頁41。

⁹⁴ 元·張嗣德，〈陵臺晚眺〉，《元詩選癸集》，冊下，頁1362。

⁹⁵ 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張天師嗣德小傳》，冊下，頁1360。

由上述探討可見，在李陵臺的空間書寫中，書寫者在敘寫空間時，往往持續著當時與現在的固定對照，其中有引向時間無常之傷懷者，亦有僅僅揭示今昔變遷者。然而，相對於前者，後者無疑更多的展示了在時間性的過程中李陵臺地景意義的變化，這似乎也適用於 Mike Crang 在討論地景意義時，所提出的羊皮紙概念，「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⁹⁶換言之，這種混合現象也展現了書寫者對於李陵臺的獨特認知。

三、懷古場所中的身體實踐

如前所述，當上京紀行詩的書寫者們，通過文字與李陵臺對視時，此時李陵臺已不再是無法到達的想像風景，而是一場親身觀察(eyewitness observation)旅行中可以望見(gaze upon)或觀看(view)的場所，揭傒斯的〈陵臺晚眺〉，張翥(1287-1368)的〈過李陵臺〉與周應極(生卒年不詳)的〈宿李陵臺〉，就分別提出了「眺」、「過」、「宿」三種不同的身體經驗，而在種種的人身動作中，「登臨遠眺」無疑最能呈顯李陵臺作為懷古場所的特殊性。

首先，「陵臺晚眺」在元代被框定為灤京八景，而灤京八景的命題都是針對具體的景點，如龍岡、灤江、松林、天山、烏桓、敕勒川、大安閣、李陵臺等，具有實地導遊的作用。換言之，當書寫者來到李陵臺，「陵臺晚眺」就提供了一種框定式的觀看，一天之中最佳的遊覽時機在傍晚時分，理想的觀覽角度則是登臺遠眺，經過這種選擇框定之後，「一個新的環境被辨認出來，主體的凝視亦被模式化。景色、各種主體位置，以

⁹⁶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頁27。

及文字、文跡，也同時在風景形成的過程中製造出來」，⁹⁷進一步說，元代的書寫者被教導，惟有透過登臨遠眺的身體行動，才能充分領受此地風景的極致意境。

其次，當李陵臺被定義為李陵登臨望鄉之所在，這裡就成為積聚回憶的場所。透過身體行動的登臨，書寫者於是取得了與李陵之間的同情共感，如玄教道士陳宜甫（1255-1299）的〈李陵臺〉：

將軍少年真英雄，隴西家世凌邊鋒。奇材劍客五千士，自當一隊馳威風。浚稽山前突戎騎，被圍未蹈生擒計。強弓勁弩百萬兵，流血成丹皆戰驚。誰知管敢漏機密，遂使空券冒鋒鏑。歸無面目見君王，將身未免降勅敵。繼曾殺李緒，尚欲謀歸去。蒙恩雖已深，實起懷鄉心。高陵築臺望鄉國，中郎去後空哀吟，累土高一尺，望天近一尺，誰為削平山，望見長安陌。望鄉不見春復秋，將軍一去臺空留。我家住在南海上，今日登臺重淒愴。遼天漠漠飛黃雲，草中但見牛羊羣。家山不識在何處，教人空自憶將軍。⁹⁸

可以發現，李陵的登臨是「高陵築臺望鄉國」、「望鄉不見春復秋」，而後來者的登臨則是為了回憶李陵與他的故事，「今日登臺重淒愴」中的「重」正說明了籍貫南方⁹⁹的作者與其他來自帝國廣大地域的詩人們一樣，都是透過重演李陵當年登臨的行動，重新回憶與感受李陵的悲愴。

⁹⁷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收入蘇碩斌主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臺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年），頁，75。林開世利用地理學中隆結（nodal points）的觀念來說明「八景」的內在意涵，認為這些景點不只是風景美好的地點，也是空間上特殊的轉換點，是社會生產出來的特殊空間。

⁹⁸ 元·陳宜甫，〈李陵臺〉，《秋巖詩集》，卷上，頁1202-680。

⁹⁹ 陳宜甫在此詩中稱「我家住在南海上」，而其籍貫為閩（福建），故稱之南方。

換言之，登臨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紀念儀式，如同 Paul Connerton 所言的：「在紀念儀式中，我們的身體以自己的風格重演過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繼續表演某些技藝動作的能力，完全有效地保存過去」，¹⁰⁰值得注意的是在登臨李陵臺的身體行動中，也有許多為了有效保存過去的表演，比如吟詠蘇李詩——「我行到寰州，悠然見突兀。下馬登斯臺，臺荒草如雪。妖氛靄冥濛，六合何恍惚。傷彼古豪雄，清淚滋不歇。吟君五言詩，朔風共嗚咽」，¹⁰¹而在這場紀念儀式中，李陵的名字無疑是重要的關鍵字，它召喚了有關李陵的種種回憶，讓後來者在登臨遠眺時，永遠是「獨立崇臺思黯然」，¹⁰²為李陵的遭遇黯然神傷。

四、對陌生異域的新發現

上京紀行詩中的「紀行」，強調的是一種在場（presence）的經驗與記憶，書寫者要描摹的是這場旅行中所看到過、親歷過的。這種特質也讓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有了迥異於傳統邊塞書寫的展現，以許有王的〈李陵臺謁左大夫〉為例：

¹⁰⁰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90。

¹⁰¹ 宋·汪元量，〈李陵臺〉，《湖山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頁10-11。此外，元·王惲，〈題漢使任少公招李陵歸漢圖後〉，《秋澗先生大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元人文集珍本叢刊2），卷73，頁3，曾提及，「中統辛酉春予扈驛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臺也。裴回四顧，朔風邊草為之淒然。於是詠河梁之詩，嘆曹柯之議」；元·袁桷，〈次韻李伯宗學士途中述懷〉，《袁桷集》，卷15，頁263，進一步指出，不只吟詠，旅行者還競作蘇李詩形式的五言詩，「李陵臺下日遲遲，惆悵河梁執別時。漢武不知歌〈四牡〉，千年競作五言詩。」

¹⁰² 元·張鳴善，〈李陵臺晚眺次吳真人韻〉，收入元·孫存吾編，《皇元風雅後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影印），卷5，頁14。

馬馳如蟻散平岡，帳室風來百草香。羶盞泛酥皆墨湏，瘦盤分炙是黃羊。¹⁰³

這首詩的筆觸簡煉，將李陵臺所在的塞北草原寫得淡遠悠然。起句「馬馳如蟻散平岡」點出遠眺所見，極目四望，「馬馳如蟻」表現了草原的遼闊無際，「散」字則逗引出一種隨意自在之感。「帳室風來百草香」著意在捕捉草原中風動氈簾，草香流動的嗅覺感受。末二句的「羶盞泛酥皆墨湏，瘦盤分炙是黃羊」極寫塞外草原中的味覺盛宴，席中所飲皆是被稱為「細乳」的「墨湏」，¹⁰⁴盤中炙物都是號稱「北陲異品」的「黃羊」，¹⁰⁵而作為蒙古帝王御膳之物的「墨湏」與「黃羊」，也標示出旅行所在的地點與屬性。

除此之外，其他如「歲時何袞袞，風物尚悠悠。川草花芬郁，沙禽語滑柔」、¹⁰⁶「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蓮徧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飛雨逐人來」，¹⁰⁷都可以說明在上京紀行詩中，藉由親身旅行的經驗，書寫者對於李陵臺所在地域的風景感知，已經由漢族王朝時代令人害怕排斥的「窮荒」、「絕塞」，¹⁰⁸轉變成可欣賞的美景。通過宛然在目的實景

¹⁰³ 元·許有壬，〈李陵臺謁左大夫〉之一，《至正集》，卷24，頁137。

¹⁰⁴ 「墨湏」即「黑馬乳」，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兵志三·馬政》，卷100，頁2554，「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健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氈置撒帳，為取乳室」，可知蒙古帝王兩都巡幸時，自天子至百官，皆備有隨行取用的馬乳，其中「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醞都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可知被稱為「細乳」的黑馬乳是供帝王飲用，「粗乳」則為百官所用。

¹⁰⁵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卷上，頁6下，第47首，「北陲異品是黃羊」，子注，「黃羊，北方所產，御膳用」。

¹⁰⁶ 元·周伯琦，〈紀行詩·李陵臺〉，《扈從集》，與《近光集》合刊，頁6。

¹⁰⁷ 元·許有壬，〈李陵臺謁左大夫〉之二，《至正集》，卷24，頁137。

¹⁰⁸ 例如唐·胡曾，〈李陵臺〉，《全唐詩》，卷647，頁7424，「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荒。英雄不伏蠻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就以「窮荒」指稱李陵臺所在的地域，

鋪陳，塞外所見的風景也可以是一種與秀美（the Beautiful）連結的如畫風景（the Picturesque），予人平和寧靜的感受。而這些正是上京紀行詩對於陌生異域的新發現。

伍、結論

本文以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為探討焦點，關注文學文本如何對李陵臺進行構形與再現，進而釐析其與漢族王朝時代的李陵臺書寫之間的差異。現將研究成果展示於後：

元代有兩座李陵臺，一是位於唐單于都護府金河縣界的古李陵臺，一是位於兩京驛路上的元代李陵臺。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之所以盛行，與其位於大都與上京之間往來最頻繁的驛路上，有直接的關係，至於古李陵臺，元詩的紀行之作幾乎未見以其為題者。這正是上京紀行詩的李陵臺書寫異於其他時代之處，因為詩人們是在一記憶性古蹟投注他們的情感與想像。然而，不論是古李陵臺還是元代李陵臺，它們所在的位置直到十二世紀末期，仍然屬於想像地理的一部分，是漢族王朝時代經驗世界的地圖以外的外界。邊塞詩則提供了有關這些地域的知識，通過閱讀與想像，許多未曾到過邊塞的詩人，也能書寫邊塞詩，只是他們所描繪的塞外之地顯然是一個文本化的世界。在元代，蒙古帝王的兩都巡幸，將上京紀行詩中的書寫者們帶入了昔日邊塞之外的異域，有關異域的知識，以各種形式獲得補充，完整地真實起來，所以這個時代的李陵臺書寫還多了紀行的實測知識。此外，上京的京城位置也讓李陵臺的

而異族則稱之「蠻夷」，這正符合 Edward W. Said 所說的「想像地理」。又如前引的馬戴，〈贈友人邊游回〉，《全唐詩》，卷 556，頁 3383，亦稱「遊子新從絕塞回，自言曾上李陵臺。尊前語盡北風起，秋色蕭條胡雁來。」

地景意義有了變化，景觀可以是邊塞詩中可知的塞外風景，不過元代的李陵臺卻在離中心很近的區域。

如果從求真的角度觀之，蒙元帝國時期被大量書寫的李陵臺其實並不是李陵臺的原址。然而，通過「好事者」與「俚言」的命名，兩京旅程中無意義的荒臺（荒山）成為了「李陵臺」。它是不是李陵臺的原址，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地方能喚起書寫者有關李陵與李陵臺的歷史記憶，而且只要有人願意持續性的回憶，這個地方就會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陵臺晚眺」還被框定為灤京八景，藉由這種文學性的「品題」，李陵臺更成為上京富有文化意義的勝景。換言之，真實的歷史記憶就這樣附著於虛擬的懷古場所中，讓元代兩京旅程中的荒臺（荒山）成功地接收了李陵與李陵臺的相關記憶，進而豐富了自身的文化意義。

當然，這種對於李陵與李陵臺記憶的接收，也讓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必然出現有關李陵其人其事的評述。元人經常從愧恨的角度來解讀李陵，將其形塑為讓書寫者深惋歎息的悲劇英雄。事實上，李陵悲劇英雄的原型，主要是提煉自班固的《漢書》與蘇李詩，前者著重在李陵於政治與軍事事務中的悲劇命運與複雜曲折的心境，後者則側重於李陵「欲歸不得」的自傷，二者共同形構了能引發士人同情共感的悲劇英雄李陵。然而，當悲劇英雄李陵在各類藝文作品中被反覆臨摹與複製時，李陵其實已進入所謂的文化記憶中，成為一個符號。毫無疑問，上京紀行詩也加入這種對於李陵的文化造型，所以不論是對李陵「求生」的辯護與諒解，還是對於其「不能死」的遺憾，都不會改變李陵悲劇英雄的形象，只是上京紀行詩於此，更強調一種思歸睽顧的「望」以及事與願違的悲感。既然將李陵視為悲劇英雄，對他乖舛的命運寄予同情，上京紀行詩中有關李陵事件的評議，明顯地是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這種論

述或出於書寫者自身仕元的處境，亦可能受到司馬遷〈報任安書〉與《漢書》的影響。

至於最能展現上京紀行詩與漢族王朝時代李陵臺書寫之差異者，應是其空間書寫的部分。作為上京被框定的典範風景之一，李陵臺與元人之間的關係已從漢族王朝時代透過想像的「臥遊」轉變為「親臨」的經驗，書寫者在李陵臺中透過身體感官所展示的空間體驗，將迥異於之前的李陵臺書寫，而這正是這個時代李陵臺書寫的獨特之處。首先，上京紀行詩所再現的李陵臺，包括其周遭的風雲草木，恆常籠罩在一種悲淒的氛圍中。事實上，這種氛圍的營造是通過淒迷地景與悲劇英雄的連結，所以在懷古場所中，李陵將永遠停留在悲劇時刻，而李陵臺則是這些歷史記憶延伸出去的地方，眼前所看見聽見的風聲、雲影、草木、峰巒、高臺、碑石……等，都成了千年前的悲劇在現在的投影，透過這樣的凝視所篩出的風景片段，也就不不得不籠罩在悲淒的氛圍中，而這正是書寫者賦予李陵臺的獨特地方感。其次，懷古場所原就具有當時與現在兩種時序關係，二者時常形成固定的對照，藉此突顯時間的無常，李陵臺書寫當然也不例外。但在李陵臺空間書寫中，這種對照不必然引向訪古所興發的無常之悲，很多時候，書寫者只是用它來揭示現象世界中的今昔變遷，相對於前者，這部分的書寫更多的展示了在時間性的過程中李陵臺地景意義的變化。其三，書寫者在懷古場所中的身體實踐也是其殊異之處。在這些人身動作中，「登臨遠眺」無疑最能呈顯李陵臺作為懷古場所的特殊性。因為「陵臺晚眺」原就提供了一種框定式的觀看，一天之中最佳的遊覽時機在傍晚時分，理想的觀覽角度則是登臺遠眺，換言之，這是一種實地導遊，書寫者被指引，惟有透過登臨遠眺的身體行動，才能充分領受此地風景的極致意境。此外，當李陵臺被定義為李陵登臨望鄉之所在，這裡也就成為積聚回憶的場所。只有透過身體行動的登臨，

書寫者才能取得與李陵之間的同情共感，透過重演李陵當年登臨的行動，他們也重新回憶與感受李陵的悲愴與無奈。在這裡，登臨行動本身就是一種保存過去的紀念儀式。換言之，上京紀行詩的書寫者在李陵臺透過身體感官所展示的種種體驗，讓其能構築出不同於漢族王朝時代的空間表述。最後，上京紀行詩中的「紀行」，強調的是一種在場的經驗與記憶，書寫者要描摹的是這場旅行中所看到過、親歷過的。這種特質也讓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有了迥異於傳統邊塞書寫的展現，因為藉由親身旅行的經驗，書寫者對於李陵臺所在地域的風景感知，已經由漢族王朝時代令人害怕排斥的「窮荒」、「絕塞」，轉變成可欣賞的美景。通過宛然在目的實景鋪陳，塞外所見的風景也可以是一種與秀美連結的如畫風景，予人平和寧靜的感受。而這些正是上京紀行詩對於陌生異域的新發現。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宋·汪元量，《湖山類稿》，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百部叢書集成：榆園叢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 元·吳師道，《吳師道集》，元朝別集珍本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 元·周伯琦，《近光集》，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 元·柳貫，《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叢書集成續編13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 元·胡助，《純白齋類稿》，叢書集選53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元·胡奎，《斗南老人集》，四庫全書珍本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元·唐元，《筠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孫存吾編，《皇元風雅後集》，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 元·迺賢（納新），《金臺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407，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元·袁桷，《袁桷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元·貢奎，《貢文靖雲林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 元·貢師泰，《玩齋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元·馬祖常，《馬祖常集》，元代文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元·馬臻，《霞外詩集》，四庫全書珍本十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元·張翥，《蛻菴集》，四庫全書珍本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元·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陳宜甫，《秋巖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元·鄭潛，《樗菴類稿》，四庫善本叢書初編集部，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8年。
- 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正編 6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元·蘇天爵編，《元文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36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高麗·李穀，《稼亭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
- 朝鮮·金宗直編，《青丘風雅》，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 丁國祥，〈論元詩對蘇武李陵的解析〉，《榆林學院學報》卷 16 期 1，2006年 1 月。
-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王樹林，〈元代正一教馬臻、陳義高、朱思本詩文集論考〉，《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5 期 5，2009年 9 月。
-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石守謙，〈史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期 92，1993年 12 月。
- ，《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2年。
- 朱曉海，〈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古典文獻研究》輯 14，2011年 6 月。
- 何寄澎，〈《漢書》李陵書寫的深層意涵〉，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
-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
- 李軍，〈論耶律鑄和他的《雙溪醉隱集》〉，《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 2 期。

- ，〈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2期。
- 李嘉瑜，〈上京紀行詩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期14，2008年7月。
- ，〈不在場的空間——上京紀行詩中的江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期18，2010年7月。
- ，〈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空間書寫〉，《文與哲》期19，2011年12月。
- ，〈宮城與廢墟的對視——元代文學中的大安閣書寫〉，《文與哲》期21，2012年12月。
- 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期37，2006年6月。
-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收入蘇碩斌主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臺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年。
- 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2011年2期。
-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唐曉峰，《從渾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文化地理學釋義——大學講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
- 高建新，〈唐詩中的「金河」〉，《內蒙古大學學報》卷42期5，2010年9月。
- 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審美價值簡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26 期 6，2005 年 6 月。
- ，〈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邊塞詩風〉，《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1 期。
- 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 溫海清，〈北魏、北周、唐時期追祖李陵現象述論——以「拓跋鮮卑係李陵之後」為中心〉，《民族研究》2007 年 3 期。
- 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政大中文學報》期 13，2010 年 6 月。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 賈敬顏，〈王惲〈開平紀行〉疏證稿〉，收入葉新民、齊木德道爾吉編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趙延花，〈從元代上都扈從詩看瀋陽民俗〉，《北方論叢》2012 年 6 期。
- 劉宏英、吳小婷，〈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研究狀況及意義〉，《河北北方學院學報》卷 24 期 4，2008 年 8 月。
-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 年。
- ，《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
- 蘇怡如，〈流離中的自我與風景——杜甫湖南紀行詩析探〉，《東華漢學》期 13，2011 年 6 月。
-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年。
-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年。

- Hans H. Frankel (傅漢思) 著, 王蓓譯, 《梅花與宮闈佳麗》,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 年。
- David Harvey 著, 王志弘譯, 〈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臺北: 明文書局, 2002 年。
- Angela Keppler 著, 〈個人回憶的社會形式——(家庭)歷史的溝通傳承〉, 收入 Harald Welzer 編, 季斌、王立君、白錫堃譯, 《社會記憶: 歷史、回憶、傳承》 (*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 Edward W. Said 著, 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郭莞玲、游美惠、游常山譯, 《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臺北: 立緒文化事業公司, 2004 年。
- Sharon Zukin 著, 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 《權力地景: 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臺北: 群學出版公司, 2010 年。